

“需求”逻辑视角下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基于消费者均衡模型以及蛛网模型的理论视角

贾微晓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具有极强外部效应的经济形式,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趋明显。但是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的现象较为严重,主要问题就是从“供给”的逻辑出发,忽视了“需求”逻辑。而目前学界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主要来自于供给端,对需求端的深度研究较少,在理论上也呈现出“供需不平衡”的现象。文章首先从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现状出发,创新性地利用消费者均衡模型和蛛网模型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逻辑。文章提出两个创新性的观点:一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是由需求的效用和收入水平共同决定的;二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供给和需求长期弹性的平衡。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供给;消费者均衡模型;蛛网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50(2017)06-0094-10

一、前言

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自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来,到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出台,^①期间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标准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方面的法案和决议络绎不绝,让各级政府逐步形成了要重视公共文化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意识。

尽管党中央对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高度重视,也连续不断地出台相关法案,但是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依旧严峻。在这个领域,众多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也给予了不同分析,如果将这些研究成果做一个类别性的归纳就会发现其大类是供给和需求,围绕着供给的分析成果较多,例如供给模式的研究,周晓丽和毛寿龙认为供给模式的选择可以考虑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根据不同的属性将生产和供给进行类别上的分离,融合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的方法,从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多类别模式。^②关于供给机制的研究,王春林认为供给机制的前提是有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估方法,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的基础是财政,但是供给的机制是开放多元的,如何解决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有一套合理的绩效评估方法。^③关于供给效率的研

收稿日期:2017-09-11

作者简介:贾微晓(1985—),男,江苏南京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①陈信、邹金汇、柯岚馨:《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根源和现实依据》,《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2期。

②周晓丽、毛寿龙:《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及其模式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③王春林:《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构建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究,学界大部分成果都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的,例如申亮和王玉燕利用中国各个省级政府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主要分析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供给效率。^①杨林和许敬轩也同样是采用DEA和Tobit的方法来分析地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②需求方面的研究,例如徐双敏倡导要建立顾客评价机制,例如顾客规模、数量的评价,顾客体验服务满意度的评价,对创新服务项目的评价等,借以考核文化服务的供给效果。^③吕方则是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需求的重要性,他认为我国目前公共文化服务的导向要逐步由政府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这必然要建立起能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表达、选择和评估的机制。^④

虽然目前学界从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角度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但是种类和数量较供给方面的研究来说还是较少。大部分研究倡导公民的文化权利,呼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理念,而从经济学原理上,从供需长期平衡的视角上探索和研究的并不多见,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政府和市场的问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忽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逻辑,也就是“需求”逻辑,供给的方式主要从政府行政任务角度出发,基于民众需要的供给方式严重不足,无法达到具有针对性的供给。而学界则是利用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例如用DEA资料包络法来测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效率,借以比较地区间差异,比较政府财政主导模式和市场第三方合作模式的效率。这些模型和理论都是在讨论供给端的模式和效率问题,这是“供给”的逻辑。而事实上文化服务的分析重点应该放在需求端来分析,因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位是强调服务,换句话说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应理解成“文化”的公共服务,如果仅仅理解成“公共文化”的服务,那就极易导向行政任务。“文化”的公共服务,突出的理念是文化,民众需要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群体性的文化需求,有些则是个性的文化需求。即便是公共文化,也存在需求的差异。而公共服务是个模式,只是供给模式的一种,是由政府来提供的,换句话说也存在私人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公共文化服务由私人来提供的方式也屡见不鲜,例如私人开的博物馆、收藏馆、私人图书馆等,也就是说公共服务是其中一种手段。将公共文化服务理解成“文化”的公共服务,能将“文化”这个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个供给模式灵活理解。而“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就必然是基于总体民众考虑的,基于国家、政府层面考虑的文化,这些文化固然也很重要,毕竟国家的稳定是首要的,这样的文化服务也当然应该由政府以权威的形式给予。但是就目前来看,并不是所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都是这一类别的。如果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公共文化产品”类别和性质搞清楚,强行就认为都是“公共文化”,那么从思想根子上就必然认为这是政府的任务,政府的行政逻辑也就必然“坚如磐石”。

当然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是政府,这点我们不能否认,但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中适当引入市场的因素,考虑“需求”的逻辑,那就会更加合理和有效率。本文接下来将首先从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和理论研究中忽视“需求”逻辑的表现开始分析,指出其忽视“需求”逻辑的原因和后果,进而利用消费者均衡模型和蛛网模型深度分析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逻辑,重点在“需求有哪些因素影响,需求和供给如何结合,需求和供给如何实现长期均衡”等方面进行探索。

①申亮、王玉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供给效率的测度与检验》,《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②杨林、许敬轩:《地方财政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③徐双敏:《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中的主观因素研究——以〈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为例》,《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6期。

④吕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导向转变研究》,《学海》2012年第6期。

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缺乏“需求”逻辑

现实中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不尽合理的原因就是忽视了“需求”逻辑。吴理财认为,我国目前所进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由政府主导的体系,这个体系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从政府角度出发的“文化任务”和“文化治理”的主题。^①由于是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所以整个供给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存在行政政绩、部门利益等问题,以至于在其供给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理解逻辑的偏差,最主要的是对于“服务”理解的偏差。吴理财还认为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使得文化服务变成了行政事务。^②行政事务逻辑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是上级政府自上而下将任务下达到基层政府,由最后的任务执行者——基层政府提供给民众的过程。在这个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的逻辑中,对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考核评价标准,必然不是来自于民众,而是来自于上级政府。因此,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就是一种上下级的行政任务罢了,从而脱离了公共服务的逻辑和实际职能。这种所谓的公共文化服务是“行政的逻辑”而不是“服务的逻辑”。^③何谓“服务的逻辑”,服务必须先找到明确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民众,所以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是否满意必然应当作为考核服务效益的主要标准。而一旦是“行政的逻辑”,就会变成上级考核下级的标准,那么基层政府在意的是上级政府的意愿,对于民众的真实需求倒不是重要的事情了。忽视民众的需求,本质上就是没有从需求端考虑问题,不考虑需求的供给很难做到供需平衡,因此在许多地方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做“无用功”,虽然提供了大量公共文化服务,但是民众不需要,民众也不愿意去“消费”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就是上级政府认为下级政府工作不到位,继续要求加大投资力度,但是这种根植于上级“规定动作”或者说是“一厢情愿想象”的文化服务由于没有实现有效需求,往往显得严重过剩,政府的投资支出效率低下。

三、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忽视“需求”因素

目前学界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效益的测算主要是运用DEA方法,而DEA方法是对于FARRELL在1957年提出的单一产出和单一投入之比的技术效率衡量方式的延伸,将其应用于多产出多投入之比的情况,借以来衡量效率的方法。对于相对参数估计法须设定特定函数形式之生产边界,DEA法的优势在于只需利用资料本身,就可以测试每个观察值之效率,其包括基于生产边界之固定规模报酬假设的CCR模式,还有放宽此模式的变动规模报酬的BCC模式。^④这个方法的核心原理就是关于TFP(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力测度的内涵。TFP绩效评估其原理为如下之比概念:

$$\text{TFP生产力}=\text{产出}/\text{投入}$$

我们简单理解下这个原理的内容就会发现其忽视需求效用的不足之处。产出用 Y 表示,投入用 X 表示,两个时期分别为 s 期和 t 期。根据公式 $\text{TFP}=Y/X$, s 期到 t 期的总体产出成长 Y_t/Y_s 可以分别表示为 $X_t/X_s \times [(Y_t/X_t)/(Y_s/X_s)]$,其中 X_t/X_s 就是 s 期到 t 期的投入增长,而 $(Y_t/X_t)/(Y_s/X_s)$ 就是 s 期到 t 期的TFP增长。^⑤从中可以看出一段时间内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增长就是投入增长 \times TFP增长,下面用图形方式详细地将其中原理表达出来。

①②③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江淮论坛》2011年第4期。

④黄镜如、付祖增、黄美瑛:《绩效评估—效率与生产力之理论与应用》,台北:新陆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⑤贾微晓:《以生产力为标准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思考》,《经济学家》2017年第2期。

我们可以从图1看出,同样的投入水平下, F_1 的产出要优于 F_2 的产出,因为同样的投入 X_1 , F_1 的产量为 B ,而 F_2 的产量为 C ,产量 B 明显大于产量 C 。看同一个时期的话,例如从 F_2 的角度来说,投入量 X_1 能达到理想的产出量是 b 点,也就是当 X_1 的投入没有任何效率损失的时候能达到的最大值为 b 点。但是现实中由于效率的问题 X_1 的投入并不能达到 b 点,有可能只能达到 a 点,如果效率越高, a 点就越靠近 b 点,反之 a 点就越远离 b 点,所以现实中效率也是关键因素。^①而这个效率可以是技术带来的技术效率,或者是管理效率和规模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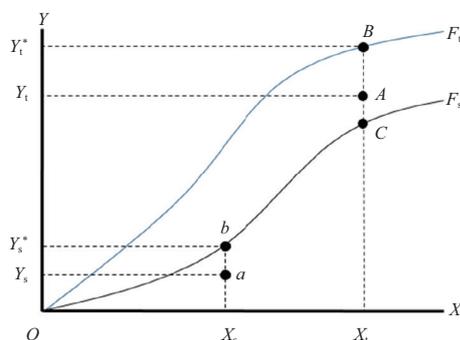


图1 产出导向边界与效率

由以上原理可知,TFP的测量方式是关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比较理想的方法,无论选择怎样的模型和测算方式,这样的分析方法都有个弊端,即忽视了需求端的因素。就算是测算出的效率是完美的那也是基于供给方来说的,因为无论是管理效率还是规模效率都是基于供给方的选择,而供给方的技术进步和效率进步如果没有需求端的效用做支持,就不能算有效供给。供给本身是根植于经济社会中的,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是有效率的生产就会产生有效供给,这个观点并不准确。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②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是有效的生产才能形成生产力。那什么才是有效的生产呢?马克思又说:“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③刘诗白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归纳总结为:有效生产是能产出有效商品的生产,而这个有效商品是可以与现实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④所以有效供给不仅仅是能有效提供商品的生产,还必须是这个商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生产。所以如果忽视了需求端,仅仅在供给端做文章,这样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只会越来越糟。任何产品的供给,都是由于人们对于该产品的需求引起的。文化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也不例外。因此,在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数量要求,另一方面还要满足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效用要求,否则将会出现文化产品需求与供给脱节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文化产品的供给不足而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另一种情况就是需求不足而出现的文化产品过剩的情况。^⑤所以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时,首先而且必然的就是要分析需求端的情况。

事实上关于从需求端考虑公共物品管理的理论早已有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英国发起并在美国及欧洲各国广泛盛行的关于政府管理的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认为要将公共行政管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分开,政府应该是政策制定者而不是政策执行者。该理论提出一个新的思维,将政府比作“企业家”,将民众比作“顾客”,该思维的逻辑是公民因纳税而应该变成享有政府这个“企业家”所提供服务的“顾客”。该理论崇尚市场竞争机制,认为应该引进竞争机制,厘清公私管理之间的界限,放开私营部门门槛,使其参与到公

① 贾微晓:《以生产力为标准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思考》,《经济学家》2017年第2期。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③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④ 刘诗白:《论增大有效供给》,《经济学家》2000年第1期。

⑤ 程恩富:《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共服务的供给中,打破公共服务的垄断性。所以“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是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公共管理的,该理论秉承了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的理念。^①从“新公共管理理论”角度来看,这个理论无疑是从供给端转向了需求端,因为该理论开始把政府比作企业,把公民比作顾客,强调顾客为导向的企业性政府,企业性政府思想的变化为以后提供高质量和多样化服务提供了高效的基础,这不得不说是个进步。但现阶段无论是实践中还是学术界的理论应用中很少把民众放在顾客的角度来分析的,几乎所有数据处理方式大多选择投入和产出的经济学原理,通过选择投入要素和产出结果分类来进行效率的比较,这样的原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只强调供给端的效率,却忽视了需求端的效用分析。

四、基于“需求”逻辑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需求,必然要涉及效用理论,效用的本质就是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程度,简单一点来说,效用就是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一种商品对消费者是否有效用,效用有多大,取决于消费者对这种商品的欲望,以及这种商品能满足消费者欲望能力的程度。效用这一概念由于与人的欲望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是消费者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评价。^②为了全面分析消费者的消费以及消费的约束边界,我们引入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的模型来分析。

如果我们从消费者均衡的模型中来看公共服务需求端,就会发现影响需求端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消费者的效用组合——无差异曲线,以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预算线。而效率最优的公共服务组合点就是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的切点,所以了解不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能力以及消费偏好才是提升供给效率的重点。

我们同样用图形来分析,图2中我们假定消费者无差异曲线为 U_1 、 U_2 和 U_3 ,其中效用水平 $U_3 > U_2 > U_1$,消费者的预算线为 AB 。根据消费者均衡原理,图2中消费者能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最优商品组合是当且仅当是预算线 AB 和无差异曲线 U_2 相切,其切点 E 就是消费者满足给定的预算约束下并且能够获得最大效用的那个点。在均衡点 E ,相应的最优购买组合为 (X_1^*, X_2^*)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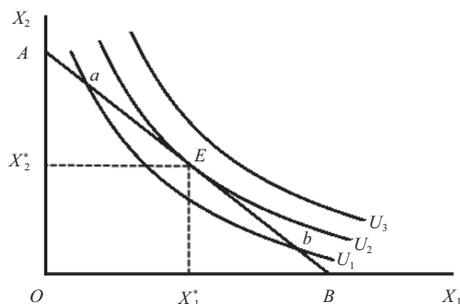


图2 消费者的均衡

如果我们用消费者均衡原理来分析公共文化服务,就会发现我们要基于两个角度来分析需求端,一是一个地区的预算线即本地区的收入水平,二是该地区的无差异曲线即本地区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用情况。

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货币收入和效用的关系。货币收入的提高会直接影响其效用水平,例如当我们收入水平较低时,可能只需要温饱的基本品;当我们的货币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时,我们对商品的效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为我们的预算线在提高,这时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了,例如车子、房子,甚至是自我个性实现的物品。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写道:“货币,由于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

① 欧文·E. 休斯:《新公共管理的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②③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的特性,因而是最出类拔萃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它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有万能者的盛誉。……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数据之间的皮条匠。”^①马克思虽然低俗化货币,但是马克思也不得不承认货币收入的力量,“由于货币为我存在的东西,我所能偿付的东西,亦即货币所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这个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②。“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亦即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借助于货币都能做到。”“当我想要一种食物的时候,或者当我身体不佳,不能步行,想坐邮车的时候,货币就给我弄到食物和邮车……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③。所以马克思认为,货币能实现需要,也能激发效用。

我们先从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来看,首先该地区的平均预算线水平是高的,因为收入的水平越高,其购买力水平也越高,其对商品的潜在效用也越高。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预算线是天然的处于高端的,但是目前学界众多学者通过数据测算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是低下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图2中来观察,如果说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只能是供给的“质”和“量”的不足(这里的量不一定是数量,反而应该是多样化、高质量的服务数量),因为当预算线达到 AB 的时候,供给的水平低下就无法实现较高的效用,这时在图中反应的就是 U_1 的无差异曲线,也就是说较发达的地区拥有的潜在效用并未得以充分满足。这样的道理有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但是在当今世界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三个假设“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倾向递减,流动偏好陷阱”似乎不那么准确了。因为凯恩斯分析的是一个封闭体,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交通的便利,人们往往会选择到外地去实现有效需求,例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到国外去消费高端文化服务,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本地区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低下,往往是低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剩,或者是高端基于本地需求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不足。除此之外,文化商品本身之间也会有互代关系,例如:电影、电视、网络视频等都是服务于文化消费者影视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他们的需求者人数大体是一定的,但观看电视、网络视频的人数增多就意味着对电影需求的减少。这就是说,相对于影视需求而言,各种影视商品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所以,在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是提供和当地预算线水平 AB 相当的文化服务产品,以期提高其效用水平让无差异曲线由 U_1 提高到 U_2 的水平,达到充分满足该地区需求偏好,否则就会致使该地区的人们选择其他商品,或者到别的地区消费公共文化服务商品,从而抑制本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潜在效用提高。

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如农村地区来说,问题的分析就稍显复杂,因为经济落后地区的首要问题是预算线的低下,也就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要受到本地区预算线的限制。从图2来看,一般经济落后地区的预算线水平为 AB ,而无差异曲线往往是 U_3 的位置(这里的 U_1 、 U_2 、 U_3 不同于上一段经济发达地区的 U_1 、 U_2 、 U_3 ,是仅仅针对本段所要解释的经济落后地区),因为落后地区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潜在需求较发达地区来说一般是充足的,他们还未达到需要高端或者是个性化的需求。但是为什么经济落后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往往也是不足的呢?答案就在那条预算线 AB 上,因为无论提供怎样的文化服务,落后地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 AB 预算的水平,让其升高来和其无差异曲线 U_3 相交,因为这样才能满足消费者均衡,如若不然,无论你提供怎样高端的文化服务或者多样化的文化服务都不可能满足均衡。所以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本质上有两个任务:一是要大力提高本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预算线 AB 的水平,让 AB 线提高到能和 U_3 相切,也就是为了能达到最高潜在服务效用而提高

①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6、107页。

收入水平;二是根据经济落后地区的预算线水平提供其消费水平相当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让 AB 线和 U_2 相切,提供能充分适合本地低收入效用下的服务,满足当地的消费偏好。当然经济落后地区的消费者均衡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和经济发达地区一样的情况,预算线为 AB ,而无差异曲线为 U_1 的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连经济落后地区最朴素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都供给不足,在低下的预算线水平下都不能保证有效需求,而这样的情况在我国农村地区也很常见。

五、“供给和需求”弹性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长期均衡

公共文化服务就其产品特性来看,往往产品周期较长,公共文化服务一旦投入建设或者立项实施,就不会轻易撤销或者是停止供给,而消费者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消费也是长期性的。分析长周期供给和需求平衡的模型最典型的要数蛛网模型了,蛛网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其分析的逻辑是本期的产量是由上一期的价格所决定,当一个均衡价格受到市场的影响发生变化时,其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和价格产生变化的趋势。本质上蛛网模型是关于供需弹性问题的分析。蛛网模型分为封闭型、开放型和收敛型三种,而决定这三种类型的蛛网模型的本质就是供需之间弹性大小的长期比较。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不同供需弹性比较下的蛛网模型的类型:

如图3所示, P 为价格, Q 为产量,1、2、3、4分别为1期、2期、3期、4期, e 为均衡期。

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 -需求量变动率/价格变动率;供给的价格弹性系数= -供给量变动率/价格变动率(其中为了比较方便负号都用绝对值来表示),弹性在图3中反映出来的就是需求曲线 D 和供给曲线 S 的斜率的倒数。

第一种情况:供给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小于需求曲线的斜率绝对值。这里需求曲线斜率绝对值的倒数就是需求弹性,同理供给曲线斜率绝对值的倒数也是供给弹性,从图3我们可以知道当市场开始偏离原有的均衡状态以后,价格和产量都会围绕均衡水平发生波动,但波动的幅度在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需求曲线的斜率绝对值大于供给曲线的斜率绝对值)的时候会越来越小,最后会回复到原来的均衡点。

分析过程如下:如果在1期中,市场中的变化让实际均衡产量 Q_e 减少到 Q_1 。那么在需求曲线上,消费者的愿意支付价格就会变成 P_1 ,从而在供给曲线上,生产者将第二期的产量增加为 Q_2 。于是到了第2期,生产者提供的产量为 Q_2 ,它所需要的价格就会变为 P_2 ,接着第2期的需求曲线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为 P_2 。那么第2期的低价格水平 P_2 又会促使生产者将第3期的产量调整为 Q_3 。在第3期产量为 Q_3 的情况下,它需要的消费者支付价格就会变成 P_3 ,因为只有 P_3 这样的价格能承担其购买全部的产量 Q_3 ,于是价格必然上升为 P_3 。如此类推生产者又会将第4期的产量增加到 Q_4 ,而价格也会随之改变。^①如果一直进行下去,其结果就如图3所示,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集中最终会回到均衡点 E 。由此可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斜率问题导致了价格和产量能否自动地恢复均衡状态。在图3中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需求曲线相较于供给曲线更为陡峭时,也就是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才能得到蛛网收敛的结果,所以供求的弹性关系是蛛网形状的必要条件。

同理第二种情况: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大于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也就是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的时候,其振动幅度会放大,两者离均衡点也会越来越远,蛛网模型呈发散状(见图4)。

^①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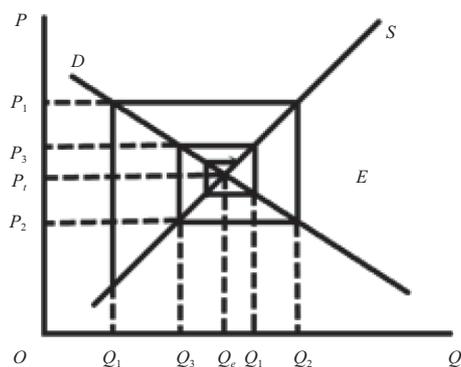


图3 收敛型蛛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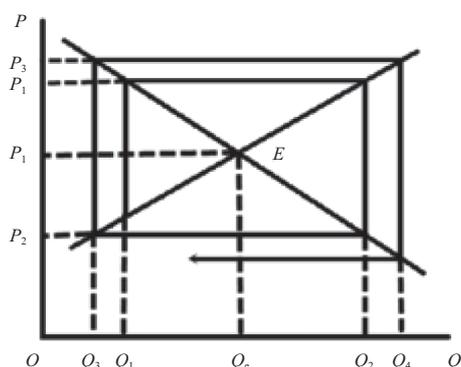


图4 发散型蛛网

同理第三种情况:供给曲线斜率的绝对值等于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也就是需求弹性等于供给弹性的时候,没有任何波动幅度,这时蛛网模型呈封闭状(见图5)。

如果我们用蛛网模型来分析公共文化服务,就会发现弹性在这当中的重要性。因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是长期性的,而需求也是长期的,一旦供给双方的弹性错位,就会发生长期不均衡的现象。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往往供给弹性是不足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形成封闭型蛛网或者是收敛型蛛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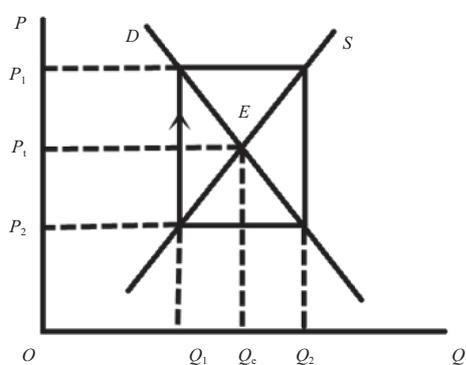


图5 封闭型蛛网

从收敛型蛛网和封闭型蛛网来看,如果想让供给和需求最终实现均衡,其必要条件就是需求曲线的斜率绝对值要大于或者等于供给曲线的斜率绝对值,换句话说就是需求曲线的长期弹性要小于或者等于供给曲线的长期弹性。由消费者均衡原理我们知道,消费者的有效需求是具有自主选择权的,也就是说在同等的预算线条件下,消费者可以自行选择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其达到效用最大化,而这种选择权就是消费者的弹性由来。对于供给者来说唯一的任务就是提供的产品(种类、数量和价格)能让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和价格之比相等。但是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的特殊性,文化产品一般都是基于文化传导的需要,可变性较弱,如果再加上其供给的方式(如果只选择政府自上而下的任务逻辑),其结果就是让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弹性变得非常小,因为政府不可能像企业那样拥有市场的充分信息和敏感度。这样一来,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就只能按照发散型蛛网模型发展,供给和需求永远不能均衡,而且会越来越偏离。所以要想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平衡,关键点就在于如何提高供给的弹性。而提高供给弹性的唯一渠道就是引入市场,因为只有市场才有对产品价格以及产品数量、种类的天然弹性,也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可以最终从需求端即消费者的角度做出平衡。

六、结 语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具有极强的外部效应的经济形式,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作用日趋明显,但由于目前公共文化服务大多由政府提供,现实中非常容易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而就目前相关研究的成果来看,大多是着眼于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分析严重不足。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的重点不是就供给谈供给,而是应该转换思路从需求端考虑,这样才能优化供给方式,改善

供给机制,调整供给模式,最终实现供需平衡。本文着眼于需求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研究在这方面的缺失与不足。文中的消费者均衡模型旨在阐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效率及产品多样性要在对消费者偏好及消费能力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而蛛网理论模型,意在倡导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方,政府在决策中必须引入市场机制,以尽可能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弹性,才可能适时迎合消费者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变化,让市场在变化中走向均衡。本文最后希望学界有更多的同仁从原理和模型上,继续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长期均衡问题进行探索,尤其是关于需求端的研究上,如何获悉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激发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满足民众的公共文化需求,从而最终实现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长期均衡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伊海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3]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程恩富. 文化经济学通论[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 [5]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6] 黄镜如,付祖坛,黄美璞. 绩效评估—效率与生产力之理论与应用[M]. 台北:新陆出版社,2010.
- [7] 刘诗白. 论增大有效供给[J]. 经济学家. 2000, (1).
- [8] Chen X, Zou J H, Ke L. Theory root and realistic basis of basic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5, 24(2): 18–23.
- [9] Hughes, O. E.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situation [M].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8–16.
- [10] Jia W X. Rethinking the supply-side reform in our country with productivity as criteria [J]. *The Economist*, 2017, 2(2): 19–25.
- [11] Lv F. The demand-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J]. *Academia Bimestrie*, 2012, (6).
- [12] Shen L, Wang Y Y. Measurement and test of government supply efficienc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7, 19(2): 26–37.
- [13] Wu L C. The operational logic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J]. *Jianghuai Forum*, 2011, (4): 143–149.
- [14] Xu S M. A study on subjective factors in the evalu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J]. *Theory and Reform*, 2015, (6): 103–106.
- [15] Yang L, Xu J X. 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local fisc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3, 1(4): 7–13.

A Study on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from a Perspective of Demand Logic: A Theoretical Viewpoint Based on Consumer Equilibrium and Cobweb Models

Jia Weixiao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s an economic form of strong externality have gradually become appar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However, because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our country nowadays are mainly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s,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ccurs easily.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owing to government-oriente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 entire supply process naturally involves problems like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and department benefits, thus, some misunderstanding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xists in the supply process, especially misconceptions about “services”. The supply proces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under the logic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affairs is the process that higher level governments assign tasks to lower level governments and then pass on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which provides for the people as the final executors of the tasks. In this top-down logic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affairs,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without doubt, comes not from the public, but from the higher 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refore, for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he entire supply proces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s merely a superior-subordinate administrative task, disengaging from the logic and actual fun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The so-calle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have become “logic of administration” rather than “logic of services”. Also, in terms of the results we have so far, most relevant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supply side, seriously lacking analysis of the demand side. The key to the problem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lies not only in the supply side, but also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demand side, so as to improve the way of supply, enhance supply mechanism, adjust the supply mode, and finally reach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mand side, which, to some degree, offsets the defects and insufficiency of such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area. Innovative ideas include: first,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s decided mutually by the levels of efficiency and income of demand. The most efficient public services combination point is the cut-off point of the budget line and the indifference curve. S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umption capabilit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the consumption preference in different areas is the key point of enhancing supply efficiency. Second, the key to the long term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our country lies in the balance of long-term flexibility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Due to the uniqueness of the product suppl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cultural products are usually produced for the need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have low variability. If the way of supply concerning governmental top-down task logic is only adopted, it would result in small flexibility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roducts, because the governments cannot obtain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sensibility towards the market as enterprises do. Because of this, the key point to a balanced supply and demand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s to enhance supply flexibility, and the only way to do so is by introducing it to the market. Only the market has the natural flexibility towards prices, quantity, and kinds of products. Also, only by introducing market mechanism a balance can be reached from the demand side, o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umers.

Key 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demand and supply; consumer equilibrium model; cobweb model

(责任编辑: 海 林)